

俄國的兩次革命： 1917與 1991

下 4 # 1/12

一 前 言

發生在1917年的俄國革命，距今已有80年。從某種意義上說，俄國因其「革命」現象而成為研究革命的寶庫。在本世紀，俄國至少經歷了三次革命：1917年的兩次革命以及從1991年8月的軍事政變到蘇聯解體的過程。此外，有人把1905年也稱為革命，但我以為將之稱為「戰後改革」或許更妥貼。其次，1929年起由斯大林發動「自上而下的革命」，對蘇聯社會造成的影響超過了1917年的革命，因為1917年革命只不過是政治革命而已。再者，從1985年開始的重建 (perestroika) 也是十分重要的政治轉折，它導致了1991年的革命；換言之，我們甚至不妨把蘇聯解體看作只是1985年以後變化的一個環節而已。

凡是精讀過列寧著作的人都知道，他在十月革命時並沒有把這場政治變動叫作社會主義革命。不過，到1918年中期為止的戰時共產主義時期，形成了一黨獨裁體制，對農民採取了強壓政策，這為後來的蘇聯以及社會主義奠定了基礎。

在1917年以後80年的今年，莫斯科召開了紀念「二月革命」80周年的會議，到11月還有「俄國社會主義革命」80周年的節目。凡是精讀過列寧著作的人都知道，他在十月革命時並沒有把這場政治變動叫作社會主義革命，而是在解散立憲會議、即革命數個月以後，才使用社會主義的字眼來表述十月革命。雖然有一種解釋說，俄國革命一開始就是以「計劃」的社會主義為目標，但這完全是「事後諸葛亮」。起初，有關革命性格、權力構想等，存在各色各樣的可能性，課題是流動的。不過，到1918年中期為止的戰時共產主義時期，形成了一黨獨裁體制，對農民採取了強壓政策，這為後來的蘇聯以及社會主義奠定了基礎。

在蘇聯解體後的今天，我們應在甚麼意義上紀念這些發生在80年前的事件呢？在三場革命當中，「二月革命」作為從帝制解體轉換為自由的、穩健的政治體制，是具有紀念意義的。最後一任的蘇聯共產黨書記戈爾巴喬夫就是一個例子。他是開始重建並且對斯大林時代進行「歷史反思」的歷史性人物。他在蘇聯解體5年後的談話中說：俄國如果不選擇列寧的十月革命而選擇「二月革命道路」的話，情況也許就好得多（《總結》，1997年第1期）。雖然這話說晚了，但他批判了十月革命和列寧。戈爾巴喬夫是當時體制中的頂峰人物，而這個體制恰好又是十月革命催生的，因此他這些話的含義就顯得格外深遠。

「十月」是我們考慮俄國革命時最有爭議的方面。但是，如果俄國沒有「十月革命」而只有「二月革命」的話，那麼歷史學家還會視俄國革命為震撼世界歷史的現象嗎？在此，筆者一方面比較1917年10月和1991年的革命，另一方面亦對二十世紀的這類現象進行考察。英國歷史學家霍布斯邦 (Eric Hobsbawm) 把二十世紀描寫為「極端的年代」，而起點正是那場與作為世界戰爭時代的二十世紀相對極的「十月革命」。日本歷史學家和田春樹曾提出，蘇聯社會主義是世界戰爭年代的產物。對此，筆者雖有後述的不同意見，但大致上還是贊成此說法。

毋庸置疑，評價「80周年」是困難的，因為它與名曰蘇聯解體的又一次革命相關聯。如果把1991年8月軍事政變崩潰、共產黨的解散、蘇聯解體一連串變動都看成是「革命」，會遇到兩個主要反論。其一是從支持1917年十月革命以後的社會主義立場出發。這一觀點稱上述變動是「後退到資本主義」，所以是「反動」的，極端地說就是「反革命」。馬克思預言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移動的歷史「發展法則」，只不過是暫時停頓，但它還會重新運行。蘇聯學者和英國的麥考萊 (Mary MacAuley) 認為，俄國將在二十一到二十二世紀再次誕生社會主義。日本的蘇聯學泰斗溪內謙教授也曾披露同樣的觀點。他們雖然都否定蘇聯的社會主義，但卻沒有明確考察與蘇聯社會主義不同的「社會主義」。另外，在前蘇聯地區，持這一想法的論者雖然比以前增多，但他們大多數都是舊體制的保守意識形態的工作者。

其二是有人倡議用從「極權主義」(Totalitarianism) 轉化為市民社會—市場經濟的範式，來理解俄國1991年以後的變化。這一觀點認為現在應該把「革命」的概念從政治學中放逐出去。持「極權主義」觀點的人在歐美的蘇聯學當中已經成為少數派，他們以蘇聯解體為契機，認為蘇聯解體是必然的，並且展開了不應用革命之詞評價的討論。

上述兩種觀點都把「革命」這一概念作為特定的意識形態，亦以黨派利害的觀點來解釋政治革命。他們雖然在肯定或否定的立場上有所不同，但思考的前提卻是一致的。所謂政治革命，是由十九世紀的馬克思主義者賦予的，它是與社會經濟變動以及歷史進步互動的一個概念。

筆者雖然不是安德森 (Perry Anderson)，但是，我想使「革命」一詞恢復其自十六世紀以來就作為政治權威變動來理解其意義，即從更廣泛的政治體制的轉變和民主化過程的角度來理解革命的含意。如果我們把從光榮革命到美國革命、甚至1956年匈牙利革命都理解為革命的話，那麼，1991年8月軍事政變以後的蘇聯解體無疑是一場「革命」。

如果把1991年8月蘇聯的解散和蘇聯解體看成是「革命」，會遇到兩個主要反論。其一是從支持1917年十月革命以後的社會主義立場出發，稱上述變動是「後退到資本主義」，所以是「反動」的、「反革命」。其二是有人倡議用從「極權主義」轉化為市民社會—市場經濟的範式，來理解俄國1991年以後的變化。上述兩種觀點在肯定或否定的立場上有所不同，但思考的前提卻是一致的。

二 世界戰爭、社會主義以及革命

如此看來，1917年革命和1991年革命儘管在意識形態的層次上是對立的，但我們也能了解到除此以外的類似現象還很多。

第一，具有決定性的問題是國際環境，尤其是戰爭與和平，這是二十世紀最大的問題。與十九世紀以前依靠僱傭兵制或者民兵作戰的戰爭相比，二十世紀的戰爭是全民皆兵的全體戰爭，其規模和影響，無論從地理或社會的範圍來看，都把全球政治與經濟捲了進去。在此意義上，二十世紀是世界戰爭的世紀。

而俄國的革命則是對於世界性戰爭的回應。事實上，1917年的革命是俄國在脫離第一次世界大戰「戰線」的過程中爆發的革命；而1991年的革命則是在脫離冷戰體制的過程中，也就是在重建之中爆發的革命。可以說，俄國的兩次革命都是在走出世界戰爭的過程中爆發的。在此以前，因為俄國社會太依附於戰爭體制，所以只有通過脫離戰爭，尋求從根本形式上變革以往的政治經濟結構。於是，俄國的這一選擇，也從根本上改變了其後的世界政治。在這個脈絡下，儘管世界政治是指廣泛的多重主體的相互作用，但它也是超越主權國家關係意義的國際政治；而正是蘇聯共產黨首先理解到勞工運動、民族解放等國際性，並適應了與國際政治相區別的世界政治。冷戰結束後，跨越國境的全球經濟和政治都以信息革命為媒介而得到擴展，這是不言自明的。

雖然這是一個世界戰爭的時代，但我們還必須注意到，二十世紀上半葉的兩次世界大戰與戰後的冷戰，兩者之間的意義是不同的。與二十世紀同步的戰爭日益增加了社會損害和生命代價，托爾斯泰等知識份子對1904年日俄戰爭中的人員傷亡已深感震驚，但第一次大戰的犧牲，其規模遠非日俄戰爭可以相比。第二次大戰的受害範圍更加擴大，與之相比較，第一次大戰只不過是小巫見大巫而已。以蘇聯人的受害情況為例證，在1918到1922年的內戰期間，蘇俄陣亡的軍人人數（不含失蹤者）94萬；在1922到1940年期間則有14萬人。而在1941到1945年的第二次大戰期間實際上有869萬人陣亡。1950到1989年，蘇聯在朝鮮戰爭有60人陣亡，在阿富汗戰爭有14,751人、最多不過16,000人陣亡（據《揭除封條的密檔》，1993年，頁407）。正如這些數字所示，蘇聯過去的戰爭觀念是把戰爭當作手段，而所謂冷戰，則是以迴避兩次大戰中的全民皆兵的慘禍為前提，尤其是迴避大量破壞和對大都市的不分清紅皂白的攻擊。

總而言之，1917年革命與其說是出於「社會主義的必然性」，還不如說是承受不了綜合性戰爭的考驗，致使帝國崩潰，這與1991年虛假普遍主義的蘇聯「帝國」的解體局面如出一轍。以此說明1991年的革命，要比以市場經濟—民主主義的普遍性更有說服力。1917年的革命還有一個背景，就是以「麵包與和平」來動員民眾運動，就連沙皇制度以及克倫斯基的臨時過渡政府都應付不了這個來自基層的民眾運動。在重建的歷史反思之中，正如蘇聯史學家指出的那樣，列寧和蘇維埃的權力派與其說是依靠社會主義理論的引導而奪取政權，還不如說是在權力解體之中力圖防止秩序崩潰而採取的預防措施。列寧不喜歡權力的空白，但正是因為出現了混沌狀態的權力真空局勢，才強烈吸引了具有奪取權力意志的蘇維埃革命派。這與1991年軍事政變後不久，葉利欽等人的「激進改革派」一樣，是被迫的革命。

從國際形勢與革命的觀點來說，自從蘇聯在1949年研製原子彈成功以及

1917年俄國革命與其說是出於「社會主義的必然性」，還不如說是承受不了綜合性戰爭的考驗，致使帝國崩潰，這與1991年虛假普遍主義的蘇聯「帝國」的解體局面如出一轍。以此說明1991年的革命，要比以市場經濟—民主主義的普遍性更有說服力。

1953年斯大林去世以後，世界戰爭的意義完全改變了。對斯大林而言，只要資本主義還存在，戰爭就是不可避免的；另一方面，斯大林以後的政治家如赫魯曉夫等人，卻以為戰爭是可以避免的。由於冷戰的特性，即意識形態的戰爭，世界卻出現了圍繞核武器的心理戰爭。冷戰雖然避免美蘇核大國之間的核武器戰爭，但取而代之的是如何構築同盟國內部秩序的問題。在此意義上，美蘇之間仍存在「象徵的戰爭」。

蘇聯依靠兩種迴避來實現美蘇對峙的冷戰格局：一是迴避對歐洲大都市的毀滅性破壞，這是心照不宣的承諾；另一是迴避與美國進行核戰爭。這樣，戰爭就向邊緣地區發展，從朝鮮半島經越南一直進入阿富汗，統統變成激戰區。由於中程核武器、戰術核武器的技術革新，導致破壞都市的局部核戰爭在現實中成為可能；而戰略防衛構想 (Strategic Defense Initiative) 也帶來了新的軍備擴張。戈爾巴喬夫在這種世界局勢下並沒有選擇核武器的世界戰爭，而選擇了脫離冷戰的戰線。也可以說，他希望的是體面的投降。

三 1917年革命以後的社會

第二，1917和1991年的兩次革命都是伴隨着權力精英、知識份子為代表的社會先進階層的覺醒而發生的，這也是俄國與發達國家比較以後發現自己的「落後」的過程。在十九世紀後半葉的近代化過程中，俄國社會運動的矛頭指向落後的政治體制。圍繞這一問題的爭論出現了兩股潮流：一是民粹主義，目標是針對俄國固有傳統的變革；另一是馬克思主義—社會民主主義，其志向是以資本主義為前提進行改革。在中國，以下觀點也許沒有得到充分認識：俄羅斯的馬克思主義是作為以資本主義工業化為前提的理論而出現的，它與主張農民革命的民粹派大異其趣。因此有必要注意到，俄國馬克思主義不僅僅限於列寧式的「革命的馬克思主義」，還有司徒盧威 (Pyotr B. Struve, 1870-1944) 等在承認資本主義化是不可避免的全球性現象的合法馬克思主義者，他們後來又轉向自由主義派，並開啟了俄羅斯自由化運動的先河。在《俄國經濟發展問題的評述》一書中，司徒盧威提出了「在資本主義大學校裏學習」的觀點，這成為(以後歷次改革的)伏線，從20年代列寧發起的學習經商活動、布哈林的「讓農民富起來」的政策，到戈爾巴喬夫提出文明式合作社，一直綿綿不絕。鄧小平的「白貓黑貓」論大概也是其中的一種變相。

在所謂的戰時共產主義期間，德國的戰時體制成為效法的榜樣，成為「共產主義ABC」的構想背景。將戰時體制的合理化與廢除商品經濟的定論相重疊，就形成了戰時共產主義，在那裏，小農經濟沒有立足之處。通過共產國際，「共產主義ABC」的戰時經濟榜樣已經變成了遍及世界的社會主義理論。從當時的留法學生鄧小平一直到滿鐵殖民地(指日偽滿洲國——譯注)的「革新官僚」，在人們的頭腦裏都打上了這種社會主義理論。在歐洲，列寧主義只是社會民主主義的

俄羅斯的馬克思主義是作為以資本主義工業化為前提的理論而出現的，它與主張農民革命的民粹派大異其趣。因此有必要注意到，俄國馬克思主義不僅僅限於列寧式的「革命的馬克思主義」，還有司徒盧威等在承認資本主義化是不可避免的全球性現象的合法馬克思主義者，他們後來又轉向自由主義派，並開啟了俄羅斯自由化運動的先河。

一個分支，但在亞洲卻變成了絕對的東西。在這裏是不准許市場經濟的存在，充其量只准許一部分而已。

世界戰爭的理論嚴格區別了世界大戰的「敵我雙方」，這影響了強調階級鬥爭的馬克思社會主義的政治觀念，而一旦當它與「誰打倒誰」的列寧式政治觀念——將農民視為小私有者的理論結合起來，歐亞大陸上的農民和農業就開始受難了。斯大林對「敵我雙方」的理解更為僵化：「非我方者即敵方」。蘇聯1928到1929年大飢荒引發的都市和農村危機，和從第一個五年計劃開始的斯大林革命，都在強化着敵我對立的意識。在斯大林的指導下，戰時共產主義完成了向以軍事工業為中心的計劃經濟轉化。這是把戰爭作為前提的社會主義，也是準戰時政治體制所推行的。順便一提，30年代，在遭受布爾什維克迫害、餓死了三分之一人口的俄國南部村子裏，誕生了後來使這個體制解體的戈爾巴喬夫。

斯大林以後的領導人迴避了斯大林進行的與農民、知識份子為敵的國內戰爭，從赫魯曉夫到勃列日涅夫都認為「非敵方者即我方」，從而容納了他們。在這種形勢下，國內外的緊張終於開始緩解，新生的市民社會與被稱為特權階層的精英份子的共存似乎也成為可能。另一方面，由於蘇聯式的泡沫經濟通過出口礦產資源而得以緩解，使得斯大林型體制保存下來。但它不能與發達國家相提並論，蘇聯在第三世界也就喪失了作為榜樣的魅力。

另一方面，在1970年代後期，蘇聯的精英們、尤其是在擔負國際關係方面職務的人們當中，出現了對於「先進的資本主義、落後的社會主義」事態的憂慮以及體制危機感。蘇聯在阿富汗的軍事挫折和波蘭的自主性工人運動（「團結工會」事件），使上述反思的傾向變得勢不可擋。在經濟方面，出現了歐洲共同體化以及日本、亞洲新興產業經濟區域（NIES）的崛起等的挑戰。於是，包括軍事部門和產業部門一體化的國防生產綜合體有關人員在內的、主張對外開放的國際派，在蘇聯推動了被稱作「重建」的體制改革。但是，以「加快速度」為口號、在國防產業部門主導下進行的安德羅波夫式的經濟改革——即體制內合理化路線，到「重建」開始後不久為止已經日暮途窮。顯然，脫離列寧式的社會主義是歷史的必由之路。因此，馬克思主義者的社會理論的局限性也就不言而喻了。

在1970年代後期，蘇聯的精英們、尤其是在擔負國際關係方面職務的人們當中，出現了對於「先進的資本主義、落後的社會主義」事態的憂慮以及體制危機感。蘇聯在阿富汗的軍事挫折和波蘭的自主性工人運動，使上述反思的傾向變得勢不可擋。

四 1991年革命後的社會

第三，1917和1991年的兩次革命都是由都市的少數派主導的。俄國1917年的革命是都市革命，這與中國「農村包圍城市」的革命不同。1991年的革命也是都市的民主派——激進的改革派抓住了軍事政變未能得逞的機會，宣揚脫離共產黨化的革命。如果說1989年東歐的「舶來品革命」是多數市民自發參加的話，那麼1991年莫斯科的革命就是「被迫的市民革命」。俄國的市民社會成熟較晚，都市民眾在選舉中支持改革派，但在1991年8月，葉利欽為了保衛最高蘇維埃會議大廈能夠挺身而出的仍然是少數人。到1993年，葉利欽炮擊了那幢大廈、解散了最高會議，標誌着少數派的進一步分裂。

如果用馬克思的話來形容，我們可以說俄國1917年的革命是「沒有工業無產階級的無產階級革命」，而1991年的則是「沒有資產階級的資產階級革命」。

正如俄國社會學家斯達利柯夫 (S. Starikov) 在其令人刮目相看的論文〈邊緣〉中所指出的那樣，我們可以從這個市民社會的破壞與社會整體的邊緣化的角度觀察蘇聯社會結構的特色。所謂邊緣，就是從社會經濟的中心看其處於周邊的位置，但是在俄國革命以後，本來就十分軟弱的自立階級進一步解體。特別是在佔農村人口80%的個體農戶解體之後的蘇聯，無論作為實體的概念還是作為方法分析的概念，都不能再使用經典含義上的「階級」概念了。不僅蘇聯的官方社會主義理論，就連作為其相對物而存在的托洛茨基的《被背叛了的革命》也沒有現實的說服能力，他曾預測勞動階級會群起反抗斯大林的官僚體制。蘇聯的工人階級是由國家創造出來的，他們僅僅是一個被切斷了的存在，而且被階層化了。雖然國家的壓抑逐漸緩和，但民眾仍然只是被動的、從屬的、四分五裂的自在之物。政治精英也被邊緣化了。一直到1937年的大肅反以前，由激進知識份子組成的十月革命的推動者們，大多數因斯大林的清洗而喪命。

取而代之，在蘇聯，國家官僚制度——斯達利柯夫稱之為唯一的「自主性身分」——變得日益重要。如果將這個存在稱為「特權階層」的話，那麼它才是蘇聯解體以及在後來市場化過程中唯一起決定性作用的原因。

蓋達爾 (Yegor Gaidar) 指出：「體制是從內部被它的統治階級推翻的，小資產階級為自己準備好了掘墓人……，比馬克思所說的更重要而且不尋常的是，在特權階層中佔多數的大眾居然對『反共產革命』非常平靜，甚至非常同情。在特權階層內部的反特權階層的革命中，只有他們通過對所有的分割過程而變得富裕起來。這樣，所謂的特權階層民營化就深入人心了」(引自《革命與進化》，1995年，頁104)。這段話使人聯想起《被背叛了的革命》。值得注意的是，蓋達爾是葉利欽政府中的急激派，與托洛茨基最沒有轆轤。實際上，據現代俄國社會學家、也是俄國精英的庫留西塔諾夫斯卡婭 (O.V. Kryshchanovskaya) 分析，75%政治精英和61%貿易關係都是來自這個特權階層的。

其實，在1991年革命中獲利最豐的就是特權階層。在國際化、市場經濟化以及包括接受國際貨幣基金 (IMF) 在內的經濟開放的過程中，俄國精英階層的利益正在急速變化。從左右世界市場的俄國天然氣部門產生了總理並不是偶然的。而這位出身於蘇聯共產黨重工業部的總理與原俄國共產黨久加諾夫是裏應外合的。

到1997年，俄國經濟的最大受害者並不是在位的特權階層，而是他們的子弟以及與金融、流通、貿易有關係的部門。1995年以後，銀行、產業金融集團的成長迅猛，至今已經發展成由奧內庫西姆銀行、摩斯托集團等七家銀行獨佔俄國50%資本的局面。過去，蘇聯的宣傳家們誇張地說：金融資本將左右西方政治，看起來，如今特權階層的子弟們已經出色地按照父輩們的預言如法炮製那樣的社會了。其實，葉利欽能夠在1996年的總統選舉中當選，就是靠這些特權階層的子弟提供資金。他們以俄國共產黨為敵，並且展開了精彩的宣傳戰。這些人包括葉利欽的女兒和斯大林的外交部長莫洛托夫的孫子。

「資本主義」正在開始奠定制度性基礎，但問題仍然是市民社會的民主化。

目前，俄國經濟的最大受害者並不是在位的特權階層，而是他們的子弟以及與金融、流通、貿易有關係的部門。過去，蘇聯的宣傳家們誇張地說：金融資本將左右西方政治，看起來，如今特權階層的子弟們已經出色地按照父輩們的預言如法炮製那樣的社會了。

十九世紀末，在俄國社會民主黨首屆大會的宣言中，合法馬克思主義者斯托爾貝寫道：「需要民主主義就像需要空氣一樣。」90年代之後，戈爾巴喬夫重提這句話。但是，從穩固市民社會以及推進民主化的觀點來看，與「俄國的發達資本主義」相比較，民主化的情況是「進一步退兩步」。自從把黑格爾和葛蘭西的市民社會概念翻譯成「資產階級社會」以後，馬克思主義者就失去了這份貴重的遺產，乃至無法理解1989到1991年的革命。

戈爾巴喬夫的夢想是依靠三權分立，產生強有力的議會和代表制的機關，但這一夢想被賦予大總統強有力的執行權限的1993年葉利欽憲法所擯棄。而葉利欽討厭政黨，致使他的憲法並不能充分發揮功能。像「我們的家園俄羅斯」這樣的執政黨，其政權最多只是天然氣等出口產業的支部而已。另一方面，國民收入的貧富差距正在擴大，促使選票又投向共產黨。

社會出現了越來越嚴重的兩極分化，這是產生「階級鬥爭」的良好土壤。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共產黨的存在又妨礙了出現健全的在野黨，因為共產黨在農業和重工業領域中仍然在指手劃腳，為特權階層的保守勢力辯護。愛國民族主義和教條主義的說教，只會令少數青年的支持者更加遠離政治。目前，國際經濟的發展，使企業和經濟的範圍已經超越了俄國。掌握克麥羅沃地區和洛里爾斯克的工人命運的並不是當地的資本家，更多的是莫斯科銀行、尤其是華盛頓的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而勞動者並沒有相應的抗議手段。如果後社會主義的共產黨只安於民族主義的話，那麼全球性的選擇就無從談起。

今後，如果既不能發展國家以外的柔性組織形態，又不能產生與市場經濟和市民社會並存的社會網絡的話，那麼，社會主義的理念就無法存續。以往的社會主義體制採取了國家這個形式，因而消耗了過多的生命力。對於否定了市民社會和市場經濟的社會主義而言，後社會主義的事態是痛苦的。正如特權階層主導的私營化所顯示的那樣，市場經濟並不能保障市民社會；可是，如果沒有市場經濟，市民社會也無以安身立命。這就是二十世紀社會主義留給我們的教訓。

社會主義本來追求的理念和道德目標是人類的解放、團結、平等以及公正，這些內容本身是古代希臘羅馬以來的一般課題，在這一含義上，社會主義的理念和運動還會持續下去。儘管在十九世紀被社會主義者批判並預言即將沒落的「資本主義」和「市場經濟」比起他們的批判要長命得多，但是，如果這個制度不能有效地克服異化和不平等這些固有缺陷的話，那麼就會經常出現否定它的思想和運動。在今天的伊斯蘭社會就產生了批判高度發達的資本主義的大眾原教旨主義的形態。

俄國十月革命的教訓要求我們對這類現象做出靈活的對應。只有對二十世紀的歷史進行自由而豁達的總結性討論，人類才能構思二十一世紀。作為這個中心課題之一，我們討論1917年10月才不會失去它的意義。

毛丹青 譯

社會主義本來追求的理念和道德目標是人類的解放、團結、平等以及公正，在這一含義上，社會主義的理念和運動還會持續下去。可是，今後如果既不能發展國家以外的柔性組織形態，又不能產生與市場經濟和市民社會並存的社會網絡的話，那麼，社會主義的理念就無法存續。

下斗米伸夫 日本法政大學法學部教授